

2013.12.25 星期三



更多“上证观察家”名家观点,请扫二维码

● 责编 杨刚 e-mail: szgjcj@ssnews.com.cn ● 美编 蔡剑平

明年经济: 稳定下行区间阻止风险上翘 A2
今年“三驾马车”几乎同时遭遇瓶颈

神隐“7天”复出
郑南雁独家告白



他曾在现实中建构理想,现在,他致力在理想中注入一种现实。郑南雁,他的名字曾与“7天”紧紧相连,现在的新身份是铂涛酒店集团联席董事长。他仍然尝试用另一种思维堆砌水泥,为每间单人房、每张双人床赋予各种感性或性感涵义。

A8

我国大宗商品需求渐显巨大空间 A3
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将明显提升

全球新均衡下的中国机遇

□ 李扬

■ 承认失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某些国家“东引”来的“祸水”,承认失衡是我们的责任。相反,认真研究失衡问题,在国际上,我们正可据此深刻揭示某些发达国家造成失衡并引发全球危机的事实;在国内,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发展道路偏颇、经济结构失调且多年难以调整的深刻原因。

■ 此次危机成为全球经济重建新均衡格局的开端。如果说,全球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甚至治理变革,基本上是几十年一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一个常态,那么,新兴经济体能够真正在经济总量上赶超发达经济体,却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新变化和新机遇。对中国而言,则更可能是千年一遇的机会。不过,能否抓住这样的机遇,从而在全球达成新均衡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就要看我们的发展方式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要看我们的经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调整,要看我们的经济效率能否持续提升,要看我们的经济质量能否有效提高。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全球失衡谁之罪

2007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无疑是被各国当局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偏爱用之来解释此次危机的根源。将危机归咎于失衡,将失衡描述为“全球”,他们便得以轻松地将对危机的责任推卸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头上。可以说,“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云云,都是从这个概念中获得其理论支持的。

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自然对此论保持了高度的戒备。作为经济学家,内心深处总觉得一味的避讳似乎是杯弓蛇影,甚至几近掩耳盗铃。平心而论,一方面,除去失衡,我们似乎还很难为危机找到更合适的根源;另一方面,承认失衡是根源,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某些国家“东引”来的“祸水”,承认失衡是我们的责任。相反,认真研究失衡问题,在国际上,我们正可据此深刻揭示某些发达国家造成失衡并引发全球危机的事实;在国内,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我们发展道路偏颇、经济结构失调且多年难以调整的深刻原因。

2009年初,我在伦敦参加了由温家宝总理和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共同主持的全球经济学家座谈会。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20余名全球大牌经济学家与会,我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座谈会安排了5位经济学家发言,我是其中之一。在向总理汇报并获同意之后,我在会上专门阐述了全球失衡的看法,要点有四:其一,失衡问题虽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关注,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伴生现象,则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便已存在。其二,观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脉络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先是亚洲“四小龙”,继而亚洲“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渐次加入了该行列。因此,如果说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机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国那里。其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称全球失衡,则世界各国的国

内经济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要义,在于世界各国均致力于调整其国内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由于当前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他们显然应承担最重要的主导性责任。其四,中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开始便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施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力求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国内投资的过度依赖。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切实步骤。

从会上和会后的评论来看,我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尊重。那次会议之后,全球失衡和再平衡问题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

均衡与平衡

失衡与再平衡这一对概念虽然总被西方政要挂在嘴上,但是,其中“衡”的具体涵义,却总是语焉不详。要深入地从事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如此重大的问题,就不能不先对“衡”的涵义做一番推敲。

失衡与再平衡中涉及的“衡”,主要有均衡(equilibrium)与平衡(balance)两种涵义。

平衡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它指的是“对立的各方面在数量和质量上相等或相抵”。

均衡一词来自物理学,指的是由于受到大小相同但作用相反的两股力的作用而使物体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引伸到经济学中,均衡是指市场上存在需求与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当需求恰好等于供给时,市场就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深入一步,经济学所说的均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瓦尔拉斯均衡,它强调的是市场供求相等,进而强调了市场出清。另一种为非瓦尔拉斯均衡,它强调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它指的是,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以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非瓦尔拉斯均衡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延伸,即

会对资本和金融项目产生对应性影响。倘若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期限结构和区域结构合理,就会大大提高在经常项目失衡(逆差或顺差)恶化的情况下,耐受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并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均衡状态的稳定。

“坏的失衡”指的是,一国在利用国内外资源过程中,难以实现长期最优配置,导致经常项目失衡持续向逆差或顺差的单方向上扩大,造成经济结构扭曲,总体风险上升。其主要表现是:其一,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部门结构不合理、出口导向型战略未能及时调整等;其二,金融结构不完善,包括不合理的储蓄行为、不当的贷款活动、金融监管缺失、本币定值过高;其三,资本频繁流动,导致外部风险上升,并使得原本已存在的不合理对外债务结构在币种上和期限配对方更加扭曲,外汇储备不足或者过度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失衡,同样,逆差并不必然意味着坏的失衡。因为,顺差和逆差的出现,都意味着一国难以在本国范围内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必须仰赖国际市场予以平衡,因而,跨境配置能力高低,是决定失衡状况是好是坏的决定因素。另外,失衡同时意味着资本与金融项目长期出现单方向国际资本流动,将对国内金融体系产生持续性冲击。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不高,这种持续性冲击将通过汇率、利率、国际储备、信贷、债券等各类市场,对国内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长期面对一种趋势,国内货币政策事实上处于被“绑架”的境地。若无运行良好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及经验丰富的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效力将持续降低。

失衡的可持续性

既然我们从均衡的概念上来讨论失衡与再平衡,失衡的可持续性便是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上,前文所述“好的失衡”,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失衡,因为处于失衡状态的国家实体经济健康,微观主体充满活力,发展前景明朗。

在本质上,全球经济失衡是实体经济现象。然而,若无货币的介入,在“纯”实体经济体系中,任何失衡都无以产生。因为,“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本就未留出发生贸易差额的任何空间。

国际货币体系因素的介入,不仅使得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得全球失衡问题变得高度复杂化。如果全球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国家可以使用其本币进行清偿和支付,则失衡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如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争论,重点便不在于失衡的原因和规模等等,而在于失衡可否持续: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国用其本国货币来支付逆差,则失衡便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失衡便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证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大略把握失衡的这种从可持续到不可持续转换的轨迹。

从建立之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覆盖的经济世界便是一个失衡的世界。起初的基本格局是,美国贸易顺差和其他国家贸易逆差相互对应并长期存在。1960年,以美国的对外债务超过其黄金储备为标志,布雷顿森林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开始转变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其他国家贸易顺差相对应,并愈演愈烈。但是,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这种失衡仍然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美国享有发行本币来弥补经常项目差额的特权——而无论欢迎与否,世界各国都必须接受美元。1971年发生的“尼克松冲击”可谓转向不可持续的关节点。从那时开始,美国国内的物价腾涌和美元的对外价值一泻千里,使得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感到维持美元本位已经得不偿失,于是爆发了持续近十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

但是,美元的故事并未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寿终正寝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核心地位固然受到了以欧元为代表的多种新兴储备货币的严峻挑战,然而,亚洲各国的相继崛起,客观上弱化了这种挑战。由于亚洲国家的货币绝大多数与美元保持密切联系,很多国家甚至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该区域作为美元的新“外围”的崛起,事实上重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强化了美元霸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因前苏联东欧国家“巨变”得以进一步巩固。上世纪90年代之前,前苏联东欧集团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并

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关键货币是卢布。苏东巨变之后,集团内的所有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其货币也不约而同地奉美元为新宗主。规模如此之大的经济体集体“投诚”,无疑为美元的货币中心地位提供了新的支持。

如此等等的发展,致使一些研究者径直将牙买加协议之后的国际货币制度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II”。我们以为,若就美国依然享受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特权这一事实而论,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固然无可,然而,若就美国在该体系内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而论,体系I、II可就大异其趣了。如今,美国完全没有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责任的约束和压力,更遑论要为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调整成本。我们以为,这种权利和责任完全脱离,正构成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无约束地仅仅立足于其国内目标,全然不顾其他国家洪水滔天。也正因为存在这种基本矛盾,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才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所在。

走向新均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今世界的头号难题,努力实现再平衡自然成为全球发展的头号任务,这是因为,始自2007年,至今仍在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因全球失衡而引发。

如果说危机的一般意义就是“脱离了常轨”,那么,所谓危机的恢复便可能有两种前程:一是回归旧轨,二是另辟蹊径。规模较小且涉及浅表的危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在那些导致脱轨的因素被修复或矫正之后,通常都会回归原轨,继续前行;而危机在深层次上触及了体制机制,并且有了新的强大因素介入了经济的运行过程,则恢复的过程将走上新途。

此次危机显然是后者,因为,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呈现出两个重要的趋势性转变,这可能会使得此次危机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格局的开端。

其一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就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持续高速增长,更成为不可移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将被改变。

其二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式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总是伴随着,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多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危机为基本特征。因此,危机的恢复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一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中而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他们被自己呼唤出来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如G20之类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产生。自然地,危机的恢复,一方面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向着多元化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决策权被逐渐削弱。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开始酝酿。

也正是在这样趋势性转变中,重建新均衡以及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首先,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期,这将有利于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其次,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和世界经济处于“治理机制变革期”,中国可以一方面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努力增强全球治理的参与能力。

如果说,全球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甚至治理变革,基本上是几十年一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一个常态,那么,新兴经济体能够真正在经济总量上赶超发达经济体,却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新变化和新机遇。对中国而言,则更可能是千年一遇的机会。不过,能否抓住这样的机遇,从而在全球达成新均衡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就要看我们的发展方式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要看我们的经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调整,要看我们的经济效率能否持续提升,要看我们的经济质量能否有效提高。

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